

创新与繁荣的五年

□ 李少君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步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诗歌创作发表机制,释放了诗歌的内在活力,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和扩散。五年来,当代诗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我们应当一直保持开放性和包容精神,只有这样,当代诗歌才能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由“高原”走向“高峰”。

这五年来,当代诗歌进入一个稳健良性发展新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诗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核心,也因此得到极大关注。当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步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诗歌创作发表机制,释放了诗歌的内在活力,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和扩散。

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的诗歌成为主旋律。

《诗刊》2014年开辟了“时代歌咏”栏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代歌咏”栏目先后发表的系列诗作,反映建设成就,面向基层生活,关注农民工生活,社会反响很大。

2015年,《诗刊》开辟了“诗旅一带一路”栏目。栏目积极组织林莽、大解、雷平阳、沈苇、叶舟、陈先发、胡弦、臧棣、陈东东、潘维、张执浩、庞培、古马等100多位诗人到“一带一路”地区进行诗歌采风创作,举办了两次“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创作研讨会,并于2017年出版了“一带一路”丛书。

2016年,《诗刊》社常设“旗帜”栏目,主要刊登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诗歌作品,先后发表了包括李琦、马新朝、郁葱、李元胜、荣荣、娜夜、桂兴华、路也、阿华、柳云、刘起伦等数十位著名诗人的优秀诗作。

2017年中,《诗刊》社开辟了“砥砺奋进的五年”专栏,刊登了车延高、王自亮、程步涛、李木马等优秀诗人的作品。并于2017年7月在海南陵水举行了“砥砺奋进的五年”中国好诗歌朗诵会。

当下诗歌活动越来越多。

当下诗歌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诗人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除了以往小规模的诗歌采风、小型诗会和诗歌朗诵会,诗歌节也经常举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两年来,各地也开始举办各类诗歌节,比如上海国际诗歌节、武汉诗歌节、成都国际诗歌节、鼓浪屿国际诗歌节。

专门的诗歌朗诵团体、诗歌朗诵晚会也开始出现,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把活动延伸到了广州、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以诗歌朗诵为主体,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读诗谈诗,场场爆满,还有探索性的诗歌春晚,以北京为主会场,以重庆、上海、青岛、西宁、成都等30余座城市为分会场诗歌晚会的举办创新了诗歌传播形式。

诗歌作品出版明显增多,诗歌研究及传播机构也不断增多。

大型诗歌选集和选本出版数量增多,综合性的如《中国新诗百年志》和《百年新诗大典》,也有各种诗歌选本,如《百年新诗卷》《中国最美的白话诗》等,此外,还有各种地方性诗歌选本,如《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福建百年百诗人诗选》等。诗歌丛书的出版也呈现上升趋势,有较早的“蓝星诗库”,也有近年广受关注的“21世纪诗丛”、“标准诗丛”、“中国好诗”等等。

诗歌年度选本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创出品牌。而中国青年出版社去年推出的《诗歌日历》,独创出了一种新颖的以时间为节点的选本形式。

诗歌研究及传播机构增多,由原来的老三家: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扩大到如今数十家。参与诗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相辅相成,诗歌研讨也会随之增多,引起社会关注。

翻译诗集畅销。

2012年2月,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去世。同年,诗人陈黎翻译的《万物静默如谜》出版,一年内销售10万册。继《万物静默如谜》之后,辛波斯卡又一经典诗集《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由青年诗人胡桑翻译,也迅速畅销。辛波斯卡诗集的热销,让人们重拾对诗歌翻译的信心。随后,布罗茨基的文集也进入畅销书系列。辛波斯卡和布罗茨基的热销,引发了诗歌翻译潮。艾略特、庞德、希尼、惠特曼等诗人诗集不断再版或接连推出,连带一些西方诗论著作也热销。西方诗歌文论的翻译,拉近了读者与西方诗歌的距离。

新媒体推动了诗歌发展。

随着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诗歌网站、论坛、博客等传播形式的不断丰富,以及以手机为载体的各种诗歌微信群的帮助,当代诗歌作品与评论、朗诵视频、诗歌活动信息随时更新,诗歌创作和传播机制产生了新变化,诗歌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据统计,诗歌博客一直是比较活跃的博客类别。微信出现后,诗歌微信公众号也大量出现。比如“为你读诗”、“睡觉前读首诗”、“诗刊社”等微信公众号,订户都在30多万到100多万。微信点对点的传播效果非常有效。“为你读诗”目前已拥有160万粉丝,阅读量经常突破10万。

与此同时,专业性的诗歌网站也开始出现,比如办了10多年的诗生活网站,至今流量可观;中国诗歌流派网仍很活跃;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诗歌网虽然只创办两年,但影响力日趋增加,已成为当前注册人数最多的专业诗歌网站。

占据传播主流地位的电视不甘落后。河北卫视率先推出《中华好诗词》节目。随后,四川卫视推出原创诗歌文化类节目《诗歌之王》,将“诗歌文化”与“音乐形式”相结合,让观众耳目一新。中央电视台也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吸引了观众参与。

诗歌创作活跃。

老一代诗人宝刀不老,如余光中、洛夫、李瑛、灰娃等近两年还常有新作发表;诗歌名人们日趋成熟,如吉狄马加、多多、杨炼、西川、于坚、翟永明等经常推出新作,并不断摘取各类国际诗歌奖。

“60后”诗人正逐渐成为诗坛主力,比如雷平阳、李元胜、海男、娜夜、荣荣、阎安、林雪等。雷平阳的诗集《基诺山》以云南的山峰为主角,抒发对自然、对家乡和大地的深情。李元胜以一首优美抒情的《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风靡全国,获得2000多万的微信阅读量,成为2015年度影响力最大的诗歌。

草根诗人的崛起也是一个亮点。2015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以余秀华、郭金牛、陈亮、曹利华、笨水、老井、玉珍等15位诗人为研讨对象,讨论底层诗歌。这些来自基层的诗人以他们真诚、质朴的诗作,引起读者和媒体的极大关注。评论家们认为:草根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真”。草根诗歌来自一个独立的“小人物”,却通向了人类深层的共性情感和经验,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貌。

“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也迅速成长,一批充满活力与朝气、充满了探索精神的青年诗人脱颖而出。其中,江非、朵渔、西娃、刘年、张二棍、徐俊国、辰水、王单单等的写作都具备了较高的辨识度。

对于新诗而言,创新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创新都应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与百年新诗都是当代诗歌的传统,我们应当在三大传统的基础上再创造,并不断创新,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歌。开放是创新和活力的源泉,我们应当一直保持开放性和包容精神,只有这样,当代诗歌才能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由“高原”走向“高峰”。



1

理论与争鸣

语词与经验现实的对称

——近五年诗歌观察的一个角度

□张清华

诗人总是能够对于一个民族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现实。

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拯救”,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对称”,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

2

在最近的五年中,汉语写作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简言之,可以归结为“语词与现实的对称”。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界限即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一样,如果世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语言也一定会有相应的表现,反之,也只有语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才意味着世界真正发生了改变。

这意味着,诗人总是能够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现实。如同罗兰·巴特所说,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诞生的时候,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是一个样子,等到他们谢世的时候,则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语言不可能是凭空变化的,他们的实践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并且恰如其分地处理了——他们所身处的历史之变化。

从这里出发,让我们来观察这个五年中汉语诗歌的某些新变。或许语言的新的可能性正被打开。

在我读到多多的几首诗时,再度感到了语言上陌生的震撼。他的词语显示了一贯的张力,一种试图“撕开”汉语固有弥合力的破坏性,这是很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汉语中深厚的文化沉淀和美学惯性,在使我们的语言成为世界上最深厚成熟的语言的同时,也使其深陷于文化的定势与板结之中。这一点,早在“第三代诗歌”运动时期就已被许多人意识到,但真正能够对汉语中这些根深蒂固的语义构成实践意义上的冲击的人则少之又少。多多这些年来的诗歌,一直以他独有的冷僻、精警、陌生和坚硬给人带来震撼和启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他的语言也并非是“完成性”的,与当年海子长诗中所传达的同样是一种撕裂的、横空出世的、试图“重新创世纪”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拟喻”力量,要远大于其实际传达的力量——说得直白些,其让人“看不懂”的,要比“看得懂”的多得多,但即便如此,它也同样具有巨大而奇异的效力。这当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却是惟一通向语言的创世纪、通向新的创造可能的途径与方式。

这涉及到了极端复杂的诗学问题:文化——语言——表意——诗,这几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在这里交汇一起,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要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样庞大精微的思辨与理论分析,方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在外围提出一点点可供思考的角度。当我们看到某种“破坏性的表达”的时候,反而看到语言的天幕上

出现了一丝让人惊异与醒目的光亮或闪电,更形象一点,用多多早年的一首《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中的诗句来说,便是“把砍进树林的光,磨得越来越亮……”但这样的状态并不总是如约而至,更多的时候如泥沼中出现的一座断桥,它让我们爬出了固有的困境,却不知最终要走向哪里。这是问题的另一个向度与可能。

或许从更简单些的角度,可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些,在语言中使用某些“策略”,可以使表意过程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几位旅居海外的诗人笔下,语言似乎出现了新的意义疆域。杨小滨的一组以“主义”或者“指南”、“后……”、“伪……”等为标签的诗歌,都足以给人带来新鲜感,这种写法在近些年臧棣的诗歌中也同样大量使用,但相比臧棣诗歌中精美的晦涩与观念化的细节,杨小滨的语言中有更多的诙谐跳脱,更多鲜活的在场感。他的一首《愤怒鸟主义》或许就是一个例证。此诗单是标题的含义就颇有游移感——是“愤怒鸟”加“主义”呢,还是“愤怒”加“鸟主义”?一个来自芬兰、流行于全世界的动漫形象“愤怒的小鸟”,似乎是全球化或网络时代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无法回避的流行符号,但“主义”则是更加古老且带着权力意味的经典文化标签,因此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想象前提,便有了类似于“后现代”的荒诞与丰富。其中的诗句也由此而更具有诙谐与多义的意趣,诗中历数了各种争斗的鸟类,鹤鹤、乌鸦、喜鹊、鹦鹉,它们的欢乐与愤怒、群居与争斗缠结在一起,亦如人类一样,无论是怎样的状况都同处一种扰攘的困境之中:“微笑更像合谋,死也要叫春”,“横眉怒目,洒一地冤魂,却是满腹虚无”……这些看似都是在说鸟,但又无一不是在说人,它们确乎比一般的比喻或拟人都更加充满歧义与混搭的“后文明”气息:“不舍身很难,鹤鹤在美景中/令人心碎,也能聊博一笑。”/愤怒没理由。”

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堪称在语言实验与扩展方面的一个例子,但又不能仅将其放入语言的范畴来谈,而必须结合另一个关乎“中国经验”的话题。

这涉及到了极端复杂的诗学问题:文化——语言——表意——诗,这几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在这里交汇一起,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要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样庞大精微的思辨与理论分析,方能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在外围提出一点点可供思考的角度。当我们看到某种“破坏性的表达”的时候,反而看到语言的天幕上

种文化意义上的“谱系感”,使其主旨更有历史纵深。

《凤凰》一诗有一个重要的“前文本”——装置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在2008年开始创作、在2009年完成的两只用城市垃圾和建筑废料等装配而成的巨大的凤凰,其大小分别为28和27米长,8米宽,重12吨,完成后吊装于北京东三环一带巨大的CBD建筑群中,白天远观,所见是两只五色斑斓的凤凰,在夜空中,则因为灯光的照射而幻生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当然,靠近审视,它们却仍是一堆废料和垃圾,所有斑斓富丽的景致都是由色彩与灯光制造出的幻觉。显然,创作者是要用这样一个现代的“材料与形制的悖反模式”,创造出一个文化隐喻,以展示对于时代的思考:从全人类的意义上,它可以看做是对于“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讽喻;从民族与时代的意义上,它可以看做是关于“当下经验”的形象概括,总之是关于“现代”、“时代”、“后工业”等文明与文化范畴的一个整体性喻指,即,它全部的美感与形式都来自于它的粗鄙、拼装与幻感,来自于它“内外之间的悖反关系”——外观越是宏大,内部越是空洞;外观越是美妙,内部越是粗鄙;看上去越是神奇幻异,实际却越不值钱。同古代文化中“凤凰”的传说与意象相比,同郭沫若当年对于涅槃中再生的凤凰——关于“未来中国”的壮美想象相比,徐冰所创造的凤凰中显然有巨大而潜在的文化忧患与“文明批判”的意义。

显然,欧阳江河的《凤凰》是基于徐冰的《凤凰》的激发,作为一个互文性的文本而诞生的,但某种意义上欧阳江河的《凤凰》却使得前者获得了意义的拓展和升华,他“从思想的原材料/去取出字和肉身”,用他一贯擅长的思辨性分析,打开了“凤凰”作为历史、神话,作为文化与文明隐喻的复杂内涵,也通过打开概念、设计者、建筑工人、诗人与预言家、资本家与购买者等完全不同的参与角色与角度,展开了这一符号的巨大的价值悖论,赋予这一先行获得了形制与材料的“艺术作品”以精神和灵魂。

要想说清楚作为诗歌文本的《凤凰》,如同欧阳江河阐释装置艺术《凤凰》一样具有难度,我可以举出其中一些“箴言”或“格言”式的句子,来显示作品本身的思辨性与概括力,显示其不俗的“整体性与碎片性同在”的思维表现力。比如:“劳动被词的臂力举起,又放下/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飞,或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它的真身越是真的,越像

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拯救”,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对称”,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语言的苏生,诗歌新疆界的生成,以及最低写作伦理的树立。它既意味着,传统或固有的某些美感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语义体系的悄悄改变与建立。

的确,如同徐冰将成千上万的材料的碎片凝结于一体,生成了这辉煌富丽的凤凰形象一样,在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词语的碎片,这无边的意义的碎片,也被欧阳江河神奇地凝结成了一个全体。尽管我们确乎已经处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但某种“有限度的整体性创造”也似乎在两个《凤凰》的文本中间隐约闪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艺术和语言的奇迹与奇观。

诗人的职责已无法成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拯救”,但可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对称”,以客观的衬映与诚实的对应来彰显变化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语言的苏生,诗歌新疆界的生成,以及最低写作伦理的树立。它既意味着,传统或固有的某些美感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语义体系的悄悄改变与建立。

诗歌:从点点滴滴做起

□蒋一谈

时至今日,关于新诗和现代诗歌的研究在学术层面还不够,新诗是对旧诗的逆转,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而且是一个大的抒情传统,但是现代诗歌需要更复杂、更深入、更冷峻、更个性的灵魂表达,或者说,现代诗是对抒情的逆反。一个复杂的诗人,新诗和现代诗都应出现在他的写作视野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纪年,这是诗歌界的大事,诗歌界人士非常关注。

1917年,胡适用自己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白话汉语因此和古代汉语相提并论。在古代汉语和白话汉语之间有一个词语,就是现代汉语,这个词概念至今仍在沿用。从学术层面而言,现代汉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那时的白话话本,也就是现代汉语的民间表述已经很发达了。而新诗到了1917年才有自己的声音,实在有些遗憾。

8年之后,也就是1924年,鲁迅先生出版了《野草》,中国新诗才真正有了现代诗歌精神,可惜在当时,这种精神太孤单了。《野草》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就是说,中国的诗歌因为《野草》开始有了现代诗和新诗在精神上的分野。

时至今日,关于新诗和现代诗歌的研究在学术层面还不够,新诗是对旧诗的逆转,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而且是一个大的抒情传统,但是现代诗歌需要更复杂、更深入、更冷峻、更个性的灵魂表达,或者说,现代诗是对抒情的逆反。一个复杂的诗人,新诗和现代诗都应出现在他的写作视野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

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诗歌更能有效地雕塑一个诗人的成长。

关于余秀华,我喜欢她的诗歌,在她还没有真正成名前,我在很多场合推荐过她的诗歌,也和一些朋友争论过。但是在诗歌美学层面而言,余秀华的诗歌还属于新诗范畴。我想打一个比方说明一下:A+B=C。A是余秀华,B是女人的命运,C是余秀华的诗歌世界。我更想看到另外一面:B+A=C。女人(人类)的命运浸淫在诗人的感受里,并通过诗人之手写出来,而不仅仅是诗人用自己的感受呈现出女人(人类)的命运。茨维塔耶娃、狄金森和普拉斯成为世界性的诗人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些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共空间的创意、设计会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是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要所生成的推动力。人活在时间和空间里,而场景文化会让人暂且忘记时间,也会让人对那一刻的时间有新的体悟。每年的六七月份,高考是一个公共话题。这些年来,中学语文的教材和课程里选了新诗,北京从2015年开始,在高考语文作文考题里有了新诗的考题选项,学生可以在议论文、叙事文和诗歌中

选项,2015年的诗歌考题是一个圆圈,2016年的诗歌题目是《荷》。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北京考生选择了诗歌,有趣的是,在北京语文高考高分段的学生里,绝大部分是那些选择了诗歌的考生,这或许能说明一个现象,诗歌是文学形式里难度最高的语言表达。敢于选择诗歌,首先表明学生的自信。同时,对诗歌语言敏感的学生,他的阅读、理解和写作综合能力是很强的。

这两年,出版了诗集《截句》,今年夏天出版了《给孩子的截句》。在同孩子和家长的交流中,我能感受到诗意的启发和熏陶,其现实的重要性超过孩子们写出自己的诗歌作品。诗意是心的萌发,孩子的心如何跳动,中国的未来就会怎样跳动。18岁以下的中国青少年近3.67亿人,中国有多少愿意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和诗人?我没有仔细统计过,感觉数量不多。

诗歌进入公共空间,也是最好的汉语表达进入公共空间。因为《给孩子的截句》这本诗集,我也想清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点点滴滴做起,在学校、在书店、在公共广场、在网络上面,为孩子们多做一些诗歌普及方面的事情。做这些事会很辛苦,但心里很愉快。